

史学研究

论庚子事变后清代宫廷外交的空间变迁

刘 强

【提 要】进入光绪朝后,清廷在实施宫廷外交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建筑空间发生了渐进的规律性变化,明显呈现出由外围向禁城、由前朝向后宫的变化趋势,一直到乾清宫与宁寿宫的最终使用为止。这种空间变迁不仅彰显了清宫建筑空间的仪式功能和中外交往较量的局面对比,也明显透露出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心态变化和清廷自身最高权力运转状况的不断变化,对于深化清代宫廷史、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庚子事变 宫廷外交 空间变迁 乾清宫 宁寿宫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9)06—0112—10

尽管清廷早在同治帝亲政后就开展了宫廷外交,^①多年来也已有茅海建、王开玺等学者对清代宫廷外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②但是笔者目前还未看到针对庚子事变后清廷继续开展宫廷外交进行研究的力作,究其原因,或与晚清史研究本有重革命一方、轻革命对象(即清廷)的情况有关,加之近代史研究中有时对空间缺乏敏感,因此对宫廷外交的空间问题少有关注。在笔者对有关材料进行梳理之后,认为庚子事变后清廷在继续开展宫廷外交时有远非“洋人的朝廷”可概括的举措,并拟就此进行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同治朝以来,根据各国外交惯例及进一步增进与清廷沟通的需要,列强一直在推动与清廷最高统治层的直接会面。然而清廷一直受“华夷之辨”等传统思想影响,不愿与列强进行平等交流,宫廷外交之路颇为坎坷,仅从有关空间来看便见端倪。

一、庚子事变之前的宫廷外交

与同治朝类似,在光绪帝亲政之前,外国使臣尚无缘觐见光绪帝,遑论进入紫禁城,即便是光

^① 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1873年6月29日)，“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觐见，上温语慰问”。参见《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第40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022331页。

^② 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23～50页；王开玺：《戊戌时期清廷觐见礼仪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28～134页。

绪帝大婚这样的大事也不例外。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89年2月21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本年正月举行皇帝大婚典礼，二月举行归政典礼，普天率土忭舞胥欢。因思国有大庆中外攸同，自各国订约通好以来信睦之谊久而弥著，各国驻京使臣均能深明大体慎固邦交，兹当盛典躬逢，允宜庆忱同洽。所有现在京城之巴兰德、田贝、盐田三郎、华尔身、库满、罗德理、李梅、维礼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庆郡王奕劻等于二月内择日在署设燕款待，并颁给如意缎匹等件。其现未在京之卢嘉德、费果孙并著一体颁给，用示朝廷行庆睦邻之至意。”^①由此可见，尽管懿旨中已言当时中外邦交睦谊，但各国使臣尚未能进入紫禁城，^②仍与清廷最高统治者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

情况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有了变化。当年正月二十五日（3月5日），“（光绪帝）御紫光阁升座，觐见各国使臣受国书毕，上温语慰问”。^③紫光阁一般是由理藩部安排、皇帝接见或赐宴蒙藏王公或藩属国使臣的场所，此次竟然用来接见呈递国书的非藩属国使臣。尽管列强使臣算是进入了皇家宫苑，显然还不是平等接待的表现，列强自然不会满意。

于是当年清廷又调整了接见外国使臣的场所。九月二十五日（10月27日），“（光绪帝）御承光殿升座，觐见奥国使臣毕格里本一人毕，上温语慰问”。^④尽管承光殿在北海不在紫禁城，但毕竟不是接见蒙藏人员或藩属国使臣的地方，因此列强也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于是从当时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间，光绪帝均在承光殿接见了列强使臣。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情况又有了变化。当年十月十五日（11月12日），“（光绪帝至）文华殿升座，觐见各国使臣受书毕，上温语慰问”。^⑤文华殿地处紫禁城前朝部分，虽不在中轴线上，但毕竟在紫禁城内，且跟蒙藏人员与藩属国无任何关系。接见当天正值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活动周期，在此时此地接见外国使臣，可见光绪帝对于中外邦交的重视程度又有提升。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状态，此时对各国使臣施以如此恩典，是否有借机示好于列强、希望列强能够助力中国之意亦未可知。之后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8日），光绪帝基本上都在文华殿接见外国使臣。^⑥

但是光绪二十四年有一个例外。当年四月初五日（5月24日），光绪帝“诣乐寿堂慈禧……皇太后前请安，辰刻诣涵元殿少坐，午刻至勤政殿升座，觐见外国亲王，上温语慰问，驾还玉澜堂”。^⑦这位亲王是德国亲王亨利，早在三月二十四日（5月14日）时慈禧太后就已于颐和园乐寿堂作了接见，当天稍晚一些时间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作了接见。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尽管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后至戊戌政变前光绪帝一般都是在紫禁城文华殿接见外国使臣，但此次换成了西苑勤政殿；二是当天早上光绪帝还在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之后赶赴西苑接见外国亲王，接见后当即又回到颐和园。至于光绪帝为何要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亨利，据茅海建先生研究，主要是由于亨利亲王在25日就要离开北京，因此希望24日时在城内重要场所将德皇赠光绪帝的勋章正式地呈给光绪帝，在清廷不愿将此次接见安排在紫禁城内更重要场所的情况下，慈禧太后

①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36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18258~018259页。

② 尽管光绪朝朝鲜使臣几乎每年都进入紫禁城觐见光绪帝，但却是以藩属国使臣的身份，不是平等国使臣的关系。

③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42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21049~021050页。

④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43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21653页。

⑤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51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25715~025716页。

⑥ 如“（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已刻上诣主敬殿少坐，至文华殿升座，觐见外国使臣，上温语慰问，驾还养心殿”。参见《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0871页。

⑦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0711~030712页。

同意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亨利，见毕光绪帝即按既定行程返回颐和园。^①

二、庚子事变后调整宫廷外交空间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直至其去世。政变后两年之内清廷政局发生了诸多变化：光绪帝发布上谕宣布慈禧太后重新训政，训政方式由之前的太后垂帘坐皇帝宝座后变为太后在宫殿明间正中宝座端坐；清廷多项政令直接以懿旨的名义发出；元旦时节皇帝率王公大臣向太后行礼的场所由慈宁门变为皇极殿；光绪帝用朱笔撰上谕宣布立顽固派宗亲子弟溥儁为大阿哥。而这两年内中外关系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列强在华谋求利权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于清廷发生戊戌政变和己亥建储的关注和干预度大增；中国军民杀掉了德国公使和日本外交官；清廷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庚子事变爆发。

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狼狈之态令其本人不堪回首，让旁人唏嘘感慨。痛定思痛之后，慈禧太后决心与光绪帝、列强修复关系，并且做了颇多努力。鉴于以往因仪式与空间问题给中外邦交带来了诸多矛盾，于是调整接见各国公使的空间便成了清廷需要用心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1902年1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国家与各友邦讲信修睦盘敦联欢，现在回銮京师，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俟择日后皇帝于乾清宫觐见各国公使。其各国公使夫人从前入谒宫廷极称款洽，予甚嘉之。兹拟另期于宁寿宫觐见公使夫人，用昭睦谊。著外务部即行预备请旨定期，一并恭录照会办理。”^②

懿旨发布当天正值西历新年，当时清廷还在从西安回銮的路上。在这个重要节点发布这样一则懿旨，自然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号，表明清廷要在中外邦交史上翻开新的篇章。

首先是“皇帝于乾清宫觐见各国公使”。相较于以前的宫廷外交空间，乾清宫的使用是一个质的飞跃。乾清宫位于紫禁城后宫部分的中轴线上，满清入关后只有顺治帝和康熙帝曾经居住于乾清宫。自雍正帝起，乾清宫只用于发挥正月赐宴于宗亲廷臣大学士和皇帝万寿时接受群臣朝贺等重要的仪式性功能，可见清代最高统治者对于乾清宫的看重。此次将乾清宫用作接见外国使臣的正式场所，也可以看出清廷对于中外邦交睦谊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能够赢得列强对于清廷态度的满意。

或许有人会讲，既然慈禧太后掌握最高权力，既然清廷如此重视中外邦交，何不把紫禁城前朝部分的三大殿选一殿，尤其是太和殿作为接见外国使臣的场所？笔者认为，这是清廷当时对待列强态度因素及慈禧太后于庚子事变后自我身份认定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实在上述懿旨发布之前，慈禧太后还于当天发布了另外两则懿旨。第一则曰：“上年京师之变，蠢贼内讷激成大衅，震惊九庙国步阽危。皇帝奉予西狩，始念亦不及此创钜痛深，盖无时不引咎自责。幸赖转旋大局宗社复安，此皆仰仗列圣宠灵渥荷上苍眷佑，得以挽回厄运保此丕基。兹者銮舆遄返匕鬯依然，钦感之余弥增悚恻，惩前毖后惟有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敬迓天庥。若复徼幸图存晏安逸豫，尚安有兴邦之一日？比虽时局粗定，而畿辅黎庶屡遭蹂躏仅有子遗，秦晋一带时苦旱荒，东南则滨江数省皆被水患，悯念吾民疮痍满目。值此国用空虚筹款迫切，何一非万姓脂膏？断不忍厚敛繁征剥削元气。深宫薄于自奉一切减省，常愿以节俭为天下先。除坛庙各处要工已飭核实估修外，其余可缓之工应裁之费皆应力杜虚糜。至于联固邦交修明内政，举凡利所当兴弊所

^① 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29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4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2849~032850页。

当革，我君臣上下务在同心协力切实讲求，次第举行认真整顿，庶几交相咨儆安不忘危，永矢忧勤惕厉之诚，痛除粉饰因循之习，实事求是，同济艰难，无怠无荒，尔内外大小臣工其与朝廷共勉之。”^①

从此则懿旨内容来看，慈禧太后首先提到了对于庚子之变造成“国步阽危”的愧疚；其次提到幸得“列圣宠灵上苍眷佑”乃“挽回厄运保此丕基”，因此“惟有恐惧修省”方可“克笃前烈以敬迓天庥”；再次提到对于“吾民疮痍满目”的“悯念”；最后才提到要“联固邦交修明内政”。由此可见，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社稷、列圣、天庥、百姓、邦交、内政应作如上排序。也就是说，从上述角度来说，“联固邦交”只是“稳定国步”、“保有九庙”、“敬迓天庥”和“悯念民生”的重要手段，不可拿太和殿等与社稷、列圣、天庥直接相关的空间与“联固邦交”相提并论。

第二则懿旨曰：“銮舆播越倏忽一载有余。当时祸乱猝乘仓皇西幸，非常之变至今实用痛心。每念宗社惊危山陵震駭，岁时祭谒废缺不修，循省多愆曷胜疚悚。兹幸安抵京师光复旧物，礼宜虔申祀事肃展微忱。太庙社稷圜丘各坛殿皇帝已定期告祭外，东陵西陵自应亲行恭谒以昭妥侑而达明禋。”^②

从此则懿旨内容来看，为了表达对宗社山陵的疚悚，太庙社稷圜丘各坛殿由光绪帝定期告祭，表明光绪帝名义“国主”^③身份的正式恢复；“东陵西陵自应亲行恭谒以昭妥侑而达明禋”，表明慈禧太后“家主”身份的继续维持。光绪帝这一“国主”身份的恢复与溥儀“大阿哥”名号的撤销，均为“母子一心”基本实现的重要证据；^④而慈禧太后以“家主”身份继续训政，则是“母子一心”的主要特色。

第三则懿旨才发布关于与列强修睦的举措。尽管慈禧太后地位高于光绪帝，在《起居注》中所载同天懿旨的次序前于圣旨，但根据内容逻辑顺序来看，反倒是同天光绪帝发布的一则圣旨早于慈禧太后的懿旨。圣旨曰：“自上年拳匪内讧开衅各国，京师倣扰宗社震惊，国势阽危间不容发。朕恭奉圣母皇太后西幸长安极艰苦，仓皇播越创钜痛深，滋列圣之悲恫，貽慈躬之忧瘁，皆由朕用人不当以致变出非常。幸赖累朝厚泽深仁，仰荷昊苍眷佑，斡旋大局得以转危为安，此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式延休命，予小子所当寅承惕厉感患不忘者也。兹值銮舆遄返行抵畿疆，痛定思痛曷胜感怆！本月二十八日回宫后，朕是日即恭诣奉先殿、寿皇殿敬谨行礼，次日恭诣大高殿、太庙祇谒告祭，择日恭诣圜丘、大社、大稷祇谒告祭，同日遣官告祭方泽、朝日、夕月各坛恭代行礼，并遣官择日告祭东陵西陵恭代行礼，用伸歉悚而展明禋。”^⑤从此则上谕中可以看出，一则光绪帝将“用人不当致变出非常”之责揽了过来，为慈禧太后开脱了罪责，自然会让慈禧太后颇感欣慰；二则光绪帝表态回京后要告祭诸坛庙，尽管光绪帝恢复坛庙祭祀权定是慈禧太后批准的结果，但从字面意思来看却是圣旨先发懿旨后发。由此可见，对于祖先昊苍的愧疚是两宫共同而首要的感受，二人也愿意“母子一心”共渡时艰，“用伸歉悚而展明禋”，同时也各自作了深有诚意的努力。这为下一步两宫在联固邦交环节协调动作打下了基础。

从上文可以看出，想要达到敬天孝祖的目的，作为“家主”的慈禧太后不可能进入前朝来行使“国主”的权力，否则将严重违反祖例，无法面对咸丰帝和列祖列宗。

①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4册，第032845~032848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4册，第032841~032842页。

③ 关于“国主”与“家主”的论述，参见刘强：《“国主”与“家主”的异化与统一——再论戊戌政变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5期，第120~127页。

④ 关于“母子一心”的论述，参见刘强：《浅论庚子之变后的“母子一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128~137页。

⑤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4册，第032850~032853页。

这样看来,无论是从清廷当时对待列强态度因素来看,还是慈禧太后当时自我身份认定的因素来看,清廷不可能把前朝三大殿作为联固邦交的备选空间。因此,清廷只能在后宫选择合适空间,于是乾清宫成为最佳选择。

三、乾清宫空间作用的发挥

虽然懿旨曰回銮后“皇帝于乾清宫觐见各国公使”和慈禧太后“另期于宁寿宫觐见公使夫人”,但实际过程却并非这么简单。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902年1月22日),“(上)诣乾清宫升座,觐见各国使臣毕,上温语慰问”。^①从字面意思看,此次是光绪帝独自一人接见各国使臣,与之前懿旨内容相符。六天后,光绪帝“奉皇太后升乾清宫,宝座同,觐见各国使臣,上温语慰问”。^②尽管此次接见慈禧太后只在座未问话,但是清廷并未就慈禧太后诣乾清宫之事发布懿旨或圣旨。如果再结合之后的使节接见来看,光绪帝六天前的接见只是打个前站,为慈禧太后长期固定化参与接见外国使臣做个铺垫。

慈禧太后在乾清宫的出现非同小可。“乾”之含义众人皆知,而乾清宫在之前清代的使用情况两宫想必也皆知。因此,对于慈禧太后和各国公使而言,乾清宫都是一个新的空间,都是让二者满意的空間。那么到底是光绪帝主动邀请慈禧太后诣乾清宫,还是慈禧太后主动要求诣乾清宫?笔者认为,既然清廷要将接见外国公使的正式场所确定在乾清宫,既然慈禧太后处于训政状态,那么必然意味着慈禧太后必将会在乾清宫出现,当然光绪帝会心领神会地提出恳请。原因如下。

辛丑年回銮后慈禧太后仍然处于训政状态,在接见国内王公大臣的场合都有慈禧太后在明殿端坐,那么慈禧太后也不可能在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一直回避,否则不能直接了解列强与光绪帝沟通的情况,不能更好地发挥“训政”的功能。尽管此次慈禧太后并未像光绪帝那样“温语慰问”,但踏入乾清宫已为慈禧太后在权力和地位环节向外界作了更为明确的仪式性宣示,而此次仪式的顺利进行也意味着慈禧太后在乾清宫的出现成为中外皆认可的事情。慈禧太后未作问话,很有可能是有意为之,先观察、体会外国使臣的态度之后以后再问话不迟。自此至光绪末年,乾清宫一直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接见正式使臣的主要场所,尤其是接受外国公使呈递国书时。

在乾清宫作为新的宫廷外交空间后,有四个关于觐见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是关于宝座的问题。在接见外国使臣时,《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中常常记载为“(上)奉皇太后升乾清宫,宝座同”,此处虽写作“宝座同”,但并非两宫真的同坐一张御案后或同一宝座上。原因何在?首先二者身份为母子,不同辈分之人在如此庄重之场合不可能在同座就座;其次,《庚子西狩丛谈》中载,庚子年和辛丑年间,在西安驻跸时,“(两宫)召见时,皇上正面坐,前有御案;太后于其后作高座,恰如舞台上之演观音王母像”,^③未同座;再次,《恽毓鼎澄斋日记》中载,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五日(1904年2月20日)“十一国使臣贺年,皇太后升宝座,上侧坐”。^④由此可见,这一高一矮、一正一侧的位置,恰恰从空间和方位上反映了两宫的实际地位。

其次是同一大殿内但不同隔间的问题。上段情况是两宫同于乾清宫正殿接见外国一般使臣时的情况,虽然不同座,但毕竟属于同一间。《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中还记载了数例同在乾清宫但在

^①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4册,第032931~032932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4册,第032945~032946页。

^③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④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不同间的情况。最早是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一日（1902年6月6日），“（上）奉皇太后升乾清宫明殿宝座，觐见俄国亲王使臣，皇太后温语慰问，皇上升西暖阁宝座，觐见俄国亲王使臣，上温语慰问”。^①这是一个很有必要关注的安排。之所以会有这不同空间的先后安排，当是沿用了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两宫在颐和园接见德国亲王亨利时的做法，故出现了上述区位空间的差别。从此处也看出了清廷对于慈禧太后“家主”身份的突出强调。

这样的情况还有几例。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1903年4月2日）“（上）奉皇太后乾清宫明殿宝座，觐见德国亲王使臣等，皇太后温语慰问。皇上升西暖阁宝座，觐见德国亲王使臣等，上温语慰问”。^②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三日（1904年5月17日），“（上）奉皇太后升乾清宫明殿宝座，觐见德国亲王阿拉拜尔及水师总兵施密满等，皇太后温语慰问；皇上升西暖阁宝座，觐见德国亲王阿拉拜尔及水师总兵施密满等，上温语慰问”。^③《恽毓鼎澄斋日记》也记载了此次接见。“德国阿刺贝尔亲王觐见，毓鼎侍班。已刻皇太后升乾清宫宝座，德使穆然及阿王水师提督以下文武官三十二员入见。阿举一黑漆匣呈御（远望不知何物），致词毕，群入西暖阁觐见皇上，佩刀铿然，杂沓而入。御前侍卫及起居注官均退出至檐外恭候约七分钟，德人退出至上书房赐宴，上亲往酬酢，毓鼎乃归。”^④《起居注》和《澄斋日记》虽然记载了同样的事情，但却有不同的侧重点。前者记述简捷明了、极其平淡，同时还透露出两宫亲切及自上而下的问候态度；而后者则更注重细节描写，尤其有两点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德亲王等“佩刀铿然、杂沓而入”，体现了德国人傲慢、随意的态度；二是“德人退出至上书房赐宴，上亲往酬酢”，体现了清廷高度重视的态度，对此《起居注》并未作记载。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1905年4月8日），“（上）奉皇太后升乾清宫明殿宝座，觐见德国亲王福礼留伯及使臣等，皇太后温语慰问，皇上升西暖阁宝座，觐见德国亲王福礼留伯及使臣等，上温语慰问毕，奉皇太后还仪鸾殿，驾还涵元殿。”^⑤《恽毓鼎澄斋日记》同样记载了此次接见：“辰刻入景运门，皇太后升乾清宫。德国使臣穆默偕亲王福留礼伯觐见。该国文武各员及医邮差各小官咸随见，共三十六人。福登宝座致词，进呈国主御容。起居注官补褂序立于宫内北上东面。使臣等复至西暖阁觐见皇帝陛下，起居注官即退。”^⑥此则情况与上则情况类似，均为德国亲王觐见。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本来当时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在西苑驻蹕，但为了此次接见，二人经景运门回到紫禁城，在乾清宫完成仪式后，又回到西苑驻蹕。

次年还有类似一例。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1906年7月4日），“（上）奉皇太后升乾清宫明殿宝座，觐见义国亲王贺尔迪安德等，皇太后温语慰问，皇上升西暖阁宝座，觐见义国亲王贺尔迪安德等，上温语慰问。”^⑦光绪帝在乾清宫接见义国亲王之后，当天即奉慈禧太后移驾颐和园驻蹕。这里有必要对此例进行补充叙述。其实当年四月下旬时两宫本来驻蹕颐和园，但为了五月初一日（6月22日）夏至祭地坛及准备前期的斋戒，故于四月二十六日（6月17日）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按照正常节奏，辛丑回銮后两宫夏日一般在颐和园驻蹕，只是在做大祀活动时才回到西苑或紫禁城，仪式毕即回到颐和园。然而此次有所不同。当年五月初一日祭地坛后两宫并未急着返回颐和园，而

①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5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3091~033093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7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4081~034083页。

③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0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5419~035421页。

④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44页。

⑤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2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6355~036356页。

⑥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64页。

⑦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4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7705~037706页。

是先于五月初四日（6月25日），光绪帝“至乾清宫升座，觐见法国使臣巴旦德等呈递国书，上温语慰问”，^①后于五月初九日（6月30日），光绪帝“诣大高殿拈香报谢（渥沛甘霖）”，再到五月十三日接见义国亲王，之后于当日返回颐和园驻蹕。看来，此举既为了礼遇义国亲王和法国使臣，同时也为了避免自身往返奔波，可谓一举两得。

第三类是两宫是否同时参加每次使臣接见仪式的问题。尽管《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中有诸多两宫同时在乾清宫接见使臣的记载，但并非每次接见两宫同时在明殿宝座上出现。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五日（1904年2月20日）已刻，“（上）御乾清宫升座，觐见大西洋国使臣白郎谷呈递国书，上温语慰问”。^②从此则信息的字面意思来看，慈禧太后似乎并未在场。究其原因，或许慈禧太后认为接受国书是国主该做的事情，而自己不是国主不便出场；又或许是这种事情仅仅是仪式性的行为，慈禧太后自认为无需出场。

但事实上另一则材料证明，这样的场合慈禧太后还是要出场的，只不过没直接在明殿的宝座上就座，而是在西暖阁帘后就座。《恽毓鼎澄斋日记》载，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二日（1904年3月18日），“韩国新使臣闵泳喆在乾清宫觐见，呈递国书。上升座，起居注官序立于门内，负西壁。西暖阁门外张黄绫幄，皇太后坐观焉。诸臣立处只一绫之隔，故立须稍下，防以身触幄。凡耳语咳唾，毕宜慎之。使臣用日本服色，甚矜持，读颂词几不成声，其进退颇濡滞。庆邸及那尚书屡以手左右之。礼毕各退。”^③从此则信息可以看出至少两个重要信息：一则从形式上看，接受外国使臣呈递国书是国家元首才能做的事情，慈禧太后虽然掌握实权，但并非国家元首，因而不便在明殿就座；二是朝鲜只是东方小国慈禧太后尚且如此重视，可见在光绪帝接受其他欧美国家使节呈递国书时，慈禧太后也应该会在某处地方垂帘观察了，甚至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902年1月22日）光绪帝首次在乾清宫接见各国使臣时也在乾清宫。

第四是是否全部外国亲王都能进入乾清宫被两宫接见的问题。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第一例是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1903年4月13日），“皇太后升保定府行宫前殿明殿宝座，觐见巴宴国亲王禄佩希特等，皇太后温语慰问，上升西暖阁宝座，觐见巴宴国亲王禄佩希特等，上温语慰问”。^④巴宴国究竟在何方、其国情如何笔者至今尚未得知，但想必是一不知名小国。尽管在接见该亲王时两宫区分了接见空间，但只是安排在两宫谒西陵后回京路上的保定行宫中接见，区分的不仅是两宫的尊卑，应当还有该国与欧洲列强的国力对比。第二例是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10月13日），“（上）奉皇太后升仁寿殿明殿宝座，觐见日本国王爵博恭及使臣林权助等，皇太后温语慰问，皇上升南间宝座，觐见日本国王爵博恭及使臣林权助等，上温语慰问”。^⑤从空间来看，虽然与戊戌政变前接见德国亨利亲王的空间一致，但与同年两宫在乾清宫接见义国亲王不同，颐和园仁寿殿的政治意义自然不能与乾清宫相比。清廷之所以如此安排，除了或与当时两宫并无大祀等仪式必须回紫禁城或西苑有关外，也应与当时清廷对待各国的态度不同有关。日本虽然亦为世界强国，但前一年日俄战争刚刚在中国国土上结束，清廷或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故在次重要的仁寿殿来安排对日本国王爵的接见。如此看来，尽管当时中国是弱国，但还是有着自己敏感的态度表达，不过这一点尚需进一步加以研究才可定论。

①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4册，第037685~037686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0册，第035153~035154页。

③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34页。

④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7册，第034127~034128页。

⑤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5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7959~037960页。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中还有多例记载两宫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的情况。事实上，自光绪二十八年起，两宫在乾清宫不仅接见某一两国使臣，而且还多次于正月初接受各国使臣共同拜年，对此《恽毓鼎澄斋日记》也有记载。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1903年2月6日），“各国公使觐见贺岁。……已正二刻，皇太后、皇上升乾清宫，起居注官常服补褂序立于殿内东面北上。各国公使参随共七十余人会齐入见，公致颂辞。各公使又趋宝座案前，分致颂辞。皇太后亦以吉祥语分答，礼毕而退。”^①

两宫不仅在乾清宫接见各国使臣，而且还接见了不少其他外国人士。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1903年2月9日），“（上）奉皇太后升乾清宫，宝座同，觐见总税务司赫德、北堂教主林懋德刘克明三人，皇太后温语慰问，上温语慰问”。^② 这三位外国人士对于增进清廷与列强的沟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颇受慈禧太后重视，故安排接见。《恽毓鼎澄斋日记》中亦载“（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六日（1904年2月21日）总税务司赫德、总教樊国梁、副总教林茂德（乾清宫）觐见”，但写明“系私觐礼，起居注官不侍班”。^③

《起居注》中还多次记载了两宫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之后当天即赶往颐和园驻蹕的情况，例如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二日（1904年8月12日）和三十二年七月初二日（1906年8月21日），光绪帝分别接见比国使臣葛飞业及参赞博费尔等^④和接受日本使臣林权助等呈递国书，^⑤之后“诣倚虹堂少坐，至龙王庙拈香，至水木自清跪接皇太后驻蹕颐和园乐寿堂，驾还玉澜堂”。七月初二日是清廷孟秋时享太庙的次日，在此节点接见外国使臣后返回颐和园驻蹕，既不影响祭祀祖先，又有利于巩固邦交，还不太影响两宫在颐和园驻蹕，一举三得。由此可以看出，七月初二日是清廷特意安排的日子，由此可见清廷对祖先、列强的重视，以及二者在清廷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位次。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1908年4月1日）和二十五日（4月25日），光绪帝分别“至乾清宫升座，觐见意国使臣文吉及头等参赞博尔济斯等呈递国书，瑞典国使臣倭伦白及头等参赞克德伦等呈递国书”^⑥和“至乾清宫升座，觐见大西洋国使臣森达等呈递国书”。^⑦当时光绪帝身体状况不甚康健，从上一年起就放弃了数次大祀，此二次接受国书当属克服困难勉强为之。事毕，光绪帝“奉圣母皇太后幸颐年殿……驾还涵元殿”。^⑧

四、从乾清宫到宁寿宫

前文提到光绪二十七年两宫回銮后不久，便于十二月十九日（1902年1月28日）在乾清宫接见了各国公使。四天后（2月1日），两宫又在慈禧太后驻蹕之处——宁寿宫作了接见。“（上）奉皇太后升养性殿，宝座同，觐见各国使臣及使臣夫人等，上温语慰问。”^⑨ 此处有几则重要信息：一是接见场所为宁寿宫区养性殿，从场所来看是非正式接见；二是接见对象除了各国使臣外，增加了女眷；三是慈禧太后依然未问话，仍由光绪帝问话。次年五月初五日（1902年6月10日），“（光绪帝）奉

①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06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7册，第033895~033896页。

③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29页。

④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1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5661~035662页。

⑤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5册，第037821~037822页。

⑥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8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9677~039678页。

⑦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8册，第039781~039782页。

⑧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8册，第039782页。

⑨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4册，第032971~032972页。

皇太后升（宁寿宫）乐寿堂，宝座同，觐见各国使臣及使臣夫人等，皇太后温语慰问，上温语慰问。”^①在此次接见的时候，慈禧太后终于开口问了话。

之后几年中，又发生了多起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在宁寿宫接见使臣及夫人的情况。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这几年中却从未出现过在乾清宫内接见女眷的情况，即便是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1905年9月14日）接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女时也未在乾清宫。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则慈禧太后对于性别差异的概念还是非常明显，二则清廷对于乾清宫的内涵定义也是非常明确的。

除乐寿堂和养性殿外，慈禧太后还有五次在宁寿宫最重要的空间——皇极殿接见外国使臣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次会见不仅未提使臣女眷之事，且都是呈递国书的情况。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1904年11月12日），“（上）奉皇太后升皇极殿，宝座同，觐见奥国使臣齐干等、美国使臣康格等、德国使臣穆默等、俄国使臣雷萨尔等、比国使臣葛飞业等呈递国书，皇太后温语慰问，上温语慰问。”^②十一天后（11月23日），“（上）奉皇太后升皇极殿，宝座同，觐见英国使臣萨道义等、日本国使臣内田康哉等、法国使臣吕班等、韩国使臣闵泳喆等呈递国书，皇太后温语慰问，上温语慰问。”^③当年十二月初四日（1905年1月9日），“（上）奉皇太后升皇极殿，宝座同，觐见意国使臣巴乐礼等、和国使臣希特斯等、大西洋国署使臣阿梅达等，皇太后温语慰问，上温语慰问毕，奉皇太后还仪鸾殿，驾还涵元殿。”^④次年四月初八日（1905年5月11日），“奉皇太后升皇极殿，宝座同，觐见日国使臣贾思理等呈递国书，皇太后温语慰问，上温语慰问。”^⑤同年五月二十一日（1905年6月23日），“奉皇太后升皇极殿，宝座同，觐见墨西哥代办使臣胡尔达翻译官谷塞额呈递国书，皇太后温语慰问，上温语慰问毕，诣介繁祉门外跪接皇太后，奉皇太后幸纯一斋侍膳看戏，戏毕皇太后还仪鸾殿，驾还涵元殿。”^⑥

辛丑回銮后一般都是光绪帝在乾清宫接受外国使臣国书，慈禧太后即便在场也都是在帘后，为何此五次慈禧太后如此隆重地在皇极殿接受外国使臣呈递国书？笔者认为，从空间因素、时间因素和使臣所代表国家的集中情况来看，当是各国使臣代表各国元首向慈禧太后呈递祝贺其七旬万寿的贺信。这五次接见正好包括了当时世界上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全部国家，即奥、美、德、俄、比、英、日、法、韩、意、荷、葡、西、墨，各国的这一举动意味着充分尊重和认可慈禧太后对于中国的统治，想必让慈禧太后颇感欢悦，于是慈禧太后安排在极其重要的场所来接受祝贺。倘若是正式的国书，一定会在乾清宫接受。尽管后三次接见时慈禧太后的七旬万寿活动早已结束，但考虑到路程的远近等因素，当归入贺寿者的行列中。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1907年12月24日），“（上）奉圣母皇太后升养性殿，宝座同，觐见法国、比国使臣及使臣夫人参赞翻译等，皇太后温语慰问，上温语慰问”，^⑦这是可见记载中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最后一次在宁寿宫接见外国使臣。

尽管史料中多有两宫从宫外返回紫禁城、在紫禁城内接见完使臣随即返回宫外的情况，但事实上也有多起两宫直接在西苑或颐和园接见使臣的情况。但是，凡是有使臣正式递交国书的情况，还是在乾清宫进行。由此可见，西苑和颐和园接见只是紫禁城接见的补充，乾清宫和宁寿宫仍是清廷

①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5册，第033103~033104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1册，第035913~035914页。

③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1册，第035947~035948页。

④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1册，第036083~036084页。

⑤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2册，第036451~036452页。

⑥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2册，第036563~036564页。

⑦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77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039327~039328页。

接见外国人士的最重要场所。

五、结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实施宫廷外交的场所也在发生着变化，呈现出由外围向禁城、由前朝向后宫变化的趋势，而乾清宫与宁寿宫的使用则使得这种变化达到了几乎极致。这种时空变迁深刻彰显了清宫建筑空间的仪式功能和中外交往较量的实力对比，也显示了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心态变化和清廷自身最高权力运转状况的不断变化。其中既有主动调适，也有无奈之举。关于无奈之举，兹有一例证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六日（1908年8月2日），“三鼓时忽觉窗户玻璃大震，其声隆隆。旋闻东城火起，登屋望之，红光熊熊，火星四射。嗣探得使馆街德国营房火药炸裂，因致此祸。敌国兵房炸药逼近禁城，至危极险，幸而两圣不在宫中，否则受震惊为何如耶？此诚各国所未有之事，曷胜忧愤。”^①从《恽毓鼎澄斋日记》中所反映的事实和所体现作者当时的心态来看，自然代表了清廷当时的尴尬境地。关于主动示好，上文中所述乾清宫与宁寿宫之使用即为明证，尤其是俄国、意大利、德国三国亲王使节来访时的空间安排以及对于有女眷参与的仪式，更是进一步体现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权力运行状况和慈禧太后的性别观，对于丰富清代宫廷史、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刘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龚赛红

On the Spatial Changes of Court Diplomacy in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Gengzi Incident

Liu Qiang

Abstract: When the Guangxu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started,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court diplomacy, the use of construction space had gradually and regularly changed, apparently showing a trend of changing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Forbidden City, and from the front of the palace to the inner court, until the final use of the 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 and Palace of Tranquil Longevity. This spatial change not only deeply highlighted the ritual function of the palace spac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confrontation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but also obviously revealed the change of the mentality of the court in dealing with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constant change of the supreme power in the court. This spatial chan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court history, political history and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the Gengzi Incident; court diplomacy; spatial change; 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 Palace of Tranquil Longevity

^①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391页。